

汉魏六朝文学论稿

皋于厚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文学论稿/皋于厚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641-1078-9

I. 汉… II. 皋…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4265号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汉
网 址:<http://press.seu.edu.cn>
电 子 邮 件:press@seu.edu.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1078-9/K·18
定 价:26.00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目 录

论《史记》的批判精神	(1)
试论左思及其诗赋创作	(23)
“扬植抑丕”与民族文化心理	(46)
论鲍照诗歌的“险俗”风格	(66)
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品格	(83)
试论谢灵运诗歌“新”和“丽”的特色	(125)
谢灵运诗歌中的情、景、理	(147)
试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产生基础	(162)
试论谢灵运诗歌的艺术渊源	(181)
谢灵运诗歌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04)
关于谢灵运的几点考证	(219)
谢灵运诗文系年	(230)
谢瞻、谢惠连、谢庄诗文简析	(244)

汉魏六朝的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	(271)
搜神记与魏晋民间文化	(293)
* * *	
主要参考文献	(327)

论《史记》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也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被后人评价为“千古之至文”^①，“《五经》之橐籥，群史之领袖”^②，对后代的文学和史学都产生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伟大而不朽的丰碑。

《史记》的“伟大而不朽”，不仅仅是由于它具有“包括宇宙，总揽人物”^③的宏伟气势，其叙事的时间跨度上下三千年，从人们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直至写作《史记》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叙事的空间幅度不仅包括汉代大一统盛世的辽阔疆域，也包括作者当时所能了解的所有域外地区；“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

② 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

③ 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引司马相如语。

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①；也不仅仅是由于它“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通古今之变”，具有高屋建瓴的历史洞察力，《史记》的“伟大而不朽”更突出地表现在它驰骋古今、褒贬百代的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上，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司马迁的不朽”，在于“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② 司马迁带着锐敏的眼光和怀疑的精神审视历史，以自己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为基准评判历史，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讥弹时弊，鞭挞丑恶，对封建社会的溃疡面进行了犀利的剖析和批判，一部《史记》，处处闪耀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的锋芒，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叛逆精神、抗争精神和平民意识，表现了不同凡响的胆识与勇气。而这一点，也正是《史记》能够震烁古今、在众多的封建正史中独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史记》的批判精神，是与古代“劝善惩恶”史家传统一脉相承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退而修《春秋》，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明是非，别善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针砭世事，垂法后人，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刘勰极力强调历史著作褒贬劝惩的社会作用，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

^①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206页。

^② 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载《中国青年》，1951年，总第57期。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一般说来，优秀的历史著作都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但是就其批判的深度、广度和力度而言，任何中国古代的史书都不能与《史记》相比。《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①，但它又“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有许多史实隐而不载。而《史记》则秉笔直书，放言无惮，毫不隐讳，有许多“述汉非”^②和揭露汉代最高统治者的丑陋一面的内容。“《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史记》的‘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做出了批判和肯定，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的批判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③

我们还可以将《史记》的批判精神与《汉书》作比较。班固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刘知几：《史通·直书》。

③ 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160页。

的《汉书》也基本上遵循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对大汉盛世之下的社会黑暗面有所揭露。但班固是“奉旨”修史，是站在“圣人”的立场上、站在封建正统思想的立场上写《汉书》的，因而其批判的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甚至还会用粉饰之辞为汉成帝这样的沉湎于荒淫酒色之中的昏君唱赞歌。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却能与君主专制的封建权力结构保持相当的距离，具有相对的独立意志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不畏权势，不媚权贵，因而司马迁能够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来写作《史记》，能够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全方位的批判，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里巷风俗，大至主流意识形态，小至日常生活，《史记》都作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就历史批判意识的深邃性和宽广性而言，《汉书》与《史记》之间的差距是不能以道里计的。

—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正是独尊儒术、神雾弥漫的时代。由董仲舒等人杂揉原始儒学与阴阳家、法家思想而成的汉代儒学居于“官学”的正统地位。汉代儒学以“天人感应”为核心，把天说成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说成是具有人格性、意志性的实体。在汉代儒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今文经学”，以阴阳灾异来解释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宣扬“三统循环”、“君权神授”、“天谴”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思想，给封建

政治和封建伦理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司马迁对董仲舒那一套“天人感应”神学理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对神学观念和迷信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引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观点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
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
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
失也。”

司马迁打破了所谓“天道”的神秘感,他认为如果有什么“天道”的话,那只是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天道”是必须遵循的,因为这是“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神秘不可测的“天道”。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的“天”,也只是指自然界,而不是什么有意志、有感情、至高至尊的人格神。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批判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其语不轨”、“其语不经”,指出:“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龟策列传》则以反语讥刺的方法揭露了龟策之法的荒诞:“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董仲舒以自然界的变化来解释社会人事的变化,宣扬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宣传“皇天无亲,常与善人”、天道福善祸淫的观点。从《史记》富有灵气和激情的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思索个人命运和“天命”有无的问题。《项羽本纪》中项羽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白起列传》中的白起被人陷害,临死前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乎?”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坑之,是足以死。”《蒙恬列传》中蒙恬被赵高陷害,临死时也说:“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李将军列传》中李广尝对望气者王朔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在引刀自刭前,李广又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连连发问,对自己多舛的命运表示不解和愤慨。《史记》中的这些描写,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似乎司马迁也是相信“天命”的,其实不然。清人姚永概说:“《史记》每于愤惋不平处,又难以明言,往往归之天命,其文最为狡狴深婉。”^①今人韩兆琦说得更为透彻:“这是历史人物对造成自己悲惨遭遇的罪魁祸首不好直说,而故意做出的像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作者写这段话时内心是充满愤怒的。”“似信天命,实乃借以抒发愤

^① 姚永概:《慎宜轩笔记》卷四。

世不平”^①。

司马迁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从无数是非祸福颠倒的事实中隐隐地认识到,“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②。在《伯夷列传》中,他对“善恶必有报”的传统说法提出深刻的怀疑和否定: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如何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在《项羽本纪》的论赞中,司马迁批判项羽将失败归于天意的错

^① 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149页。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208页。

误观点,指出项羽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自身的错误铸成的,与“天意”无关。项羽之所以“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直至临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另外还写了一个至死仍不觉悟的人物蒙恬。蒙恬因赵高陷害,被秦二世赐死,死时叹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把自己的死因归结为修筑长城断绝地脉所得的报应。对此,司马迁批评说:“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对人生命运和所谓“天意”的思考,包含对统治者宣扬的天道观的怀疑,同时也是对汉代“天人感应”的官方哲学的批判,在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义利关系是价值观的核心,儒家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特别强调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更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司马迁不为圣人观点所束缚,在《货殖列传》中大胆指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还说: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袖，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蓄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在这里指出物质欲望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动机，指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这对于“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道德教条来说，其异端性是非常明显的。钱钟书对《史记·货殖列传》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斯《传》文笔腾骧，固勿待言，而卓识巨胆，洞达世情，敢质

言而不为高论，犹非常殊众也。”^①

二

最能体现《史记》敢批逆鳞精神的，是全书中随处可见的“微文刺讥，贬损当世”^②的内容。由于司马迁具有独立不迁的性格，不屈从于君主的权势，因而他始终以一种敏锐而又冷峻的眼光来审视汉王朝的历史和政治举措，用洞幽烛微之笔来剖析当权者的心理和人格，《史记》不但敢于批判历史上的暴君，而且敢于直接抨击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的皇帝，对汉代最高统治者和上流社会的种种丑恶以及官场黑暗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司马迁不赞成“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做法，他对当朝君主的揭露与批判是出于公心，富有理性精神的，并不带有丑化和发泄私愤的倾向。例如，对于汉朝的开国者刘邦，司马迁并没有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刘邦眼光远大、头脑灵活、善于用人等长处。但另一方面，司马迁又能做到不为尊者讳，直笔书写刘邦的好色、贪婪、无赖、自私、狡诈、残忍等种种劣迹，褫夺了这个封建帝王身上

①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一册第162页。

② 班固：《典引》引汉明帝语。

的神圣性，还之以乡村无赖的本相。《项羽本纪》描写了刘邦一次兵败彭城情景：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主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攻入彭城后，刘邦志得意满，整日沉湎于酒色，对敌情放松了警惕，结果被项羽打得一败涂地。清人张文虎评论说：“沛公一入秦宫，即欲留居，今入彭城，又复如此，亦无异于淫昏之主，此范增所云贪财好美姬者也。宜其为羽所破，几至灭亡哉！”^①刘邦

^① 张文虎：《舒艺室随笔》。

在仓惶逃命时,为了减轻车子的载重量,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儿子、女儿推到车下。这位所谓“受命天子”的自私残忍、毫无父爱人性的本性昭然若揭。

《张丞相列传》中有一段故事性很强的描写:“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这一问一答,充分表现了刘邦好色无耻,司马迁巧借周昌之口,说刘邦是和夏桀和商纣王一样的荒淫之主,如此之语,没有胆识是写不出来的。

《项羽本纪》写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王可以间出。”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刘邦让部将代他去死,让两千多妇女装成士兵出东门给敌人送死,以转移项羽视线,刘邦趁此开西门逃跑,其卑怯自私的本性不言自彰。纪信代君而死,其忠义可嘉,但未闻刘邦有旌表纪信之事。明代王世贞议论此事说:“帝之诸功臣孰有大于纪信者?而帝卒不录何也?旌信而成其成皋之降也。故其于信也,耻之变而泯者也。”(《读史论辨》)

又如《高祖本纪》中记载：“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一副无赖的嘴脸跃然纸上。

三

最能体现《史记》非圣诋君的精神的是书中对在位的“今上”汉武帝的批判。《三国志·王肃传》记载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答：“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①王肃认为司马迁受宫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史记》“非贬孝武”，可知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的贬损批判的确非常深刻。今本《史记》中的《孝武帝本纪》已非原来的《今上本纪》，而是后人抄录《封禅书》等篇补缀而成，但我们从《史记》的其他篇章中仍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揭露与批判。

^① 与之类似的记载有东汉卫宏的《汉旧仪注》和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裴骃《史记集解》引）。《西京杂记》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